

江南文化与白居易思想及创作关系浅探

景遐东

(湖北师范学院 文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2)

〔摘要〕白居易少年避乱旅居吴越, 不仅熟悉了江南的风土人情, 还得到了江南文化精神的熏陶, 进而产生自觉认同。青年时到宣州应乡试被荐举, 实现了人生的重要跨越。晚年刺守杭州苏州, 安闲适意人生思想与生活态度成熟定型, 诗歌创作进入又一兴盛期。江南经历丰富了乐天的人生色彩, 江南文化的重雅趣、爱自然、尚逸乐等因素, 对其人生思想、生活态度以及诗歌创作等均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白居易; 江南; 经历; 思想; 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733(2008)04-0033-06

白居易后期文学创作中回忆眷恋江南生活的诗作数量甚多^①, 感情真挚真切, 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略举几例如下:

江南名郡数苏杭, 写在殷家三十章。君是旅人犹苦忆, 我为刺史更难忘。境牵吟咏真诗国, 兴入笙歌好醉乡。为念旧游终一去, 扁舟直拟到沧浪。(《见殷尧藩侍御忆江南诗三十首中多叙苏杭胜事, 余尝典二郡, 因继和之》, 卷 26)^②

官历二十政, 宦游三十秋。江山与风月, 最忆是杭州。(《寄题余杭郡楼兼呈裴使君》, 卷 36)

江南忆, 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 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忆江南词三首》之三, 卷 34)

可以说晚年白居易有着浓厚的江南情结, 对江南的回忆留恋向往始终萦绕在其心头, 愈久弥深。这一切绝非偶然。认真梳理白居易人生轨迹, 从少年长期避乱吴越, 到二十八岁贡举宣州, 再到晚年近四载任杭州和苏州刺史, 他一生和江南结下了不解之缘。江南生活经历以及江南文化对其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尤其是其三十岁之前, 他的几次重要人生选择都与江南相关; 在文学创作方面, 其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丰富了乐天诗文创内容, 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其诗文创作风格。本文试图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对白居易各阶段的江南经历的整体考察, 寻绎这种经历及江南文化因素与乐天人生思想及创作的关系, 从而为白居易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白居易第一次长时间生活于江南, 是少年时期避乱

旅居吴越。建中三年乐天十一岁时, 其父白季庚任徐州别驾, 全家由河南新郑移居徐州附近的符离。次年中原数藩镇叛乱, 两河用兵, 乐天即随部分家人逃难江南, 直到十八岁即贞元五年返回符离^③。其诗“悠悠沧海畔, 十载避黄巾”(《江楼望归》)题下自注“时避难在越中”, 卷 13; “十年为旅客, 常有饥寒愁”(《适意二首》其一, 卷 6)就是对这段经历生动的描述, 不过“十年”乃举成数而言, 实际上他此次在江南大约只有六、七年的时间, 主要流连于苏、杭二郡及饶州、衢州等地。

东晋以来尤其是南朝江南得到了很好的开发, 唐建国后一百多年的发展更使江南的经济文化地位迅速提高, 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白居易避乱江南时离安史之乱刚刚二十多年, 此时中原战乱频繁, 社会遭受巨大破坏。北方士人百姓大量逃亡南方, 其中许多逃至江南地区: “其中原多故, 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 登会稽者, 如鳞介之集渊薮。”^④“天宝末, 安禄山反, 天子去蜀, 多士奔吴为人海。”^⑤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南迁移民。大量士人集中江南, 不仅使这一地区的文学创作迅速活跃, 也使江南的文化优势得以加强。建中、大历间, 以苏州、杭州、宣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聚集了众多诗人, 有以刘长卿、戴叔伦、韦应物等人为代表的地方官诗人群体, 以皎然、灵澈为代表的诗僧群体, 还有独标风韵的江南诗人顾况等。他们频繁地诗文唱酬, 形成了盛唐文学高峰后过渡期局部的兴盛局面。江南文士云集诚可谓盛极一时。

白居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江南的。“满眼云

〔收稿日期〕2008-02-22

〔作者简介〕景遐东(1964—)男, 江苏南通人, 湖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水色，月明楼上人”（《江楼望归》卷 13）在这里他饱览了吴越清丽秀美的自然景色，熟悉了与北方异样的风俗人情。他首次知道了进士考试：“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诗书。”（《与元九书》，卷 45）显然诗人苦节诗书以备进士考试正始于江南。更重要的是他了解、结识了其时正活跃于江南的许多杰出诗坛前辈，激起了少年白居易对未来政治与文学生活的憧憬与追求。宝历元年已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不无深情地回忆起此时在苏、杭仰慕韦应物、房孺复两位诗人郡守的经历：

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酒，每与宾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吴郡诗石记》卷 59）

韦应物少年时为玄宗侍卫，豪纵不羁，后折节读书，但豪气不减。辛文房评其诗：“驰骤建安以还，各有风韵，自成一家之体，清新雅丽，虽诗人之盛，亦罕其伦，甚为时论所右。而风情不能自己，如赠米嘉荣、杜韦娘等作，皆杯酒之间，见少年故态，无足怪矣。”^⑥又据《吴郡图经续记》，韦应物“当贞元时为郡于此，人赖以安，又能宾儒士，招隐独，顾况、刘长卿、丘丹、秦系、皎然之侑类见旌引，与之酬唱，其贤于人远矣”。^⑦可见其在苏州豪纵不羁的气度和广召文士酬唱宴集的盛况。房孺复乃房琯之子，“年七八岁，即粗解缀文，亲党奇之。稍长，狂疏傲慢，任情纵欲。”^⑧房任杭州刺史在建中二年至贞元六年间，韦则于贞元四年始出任苏州刺史^⑨。二人任职江南重镇，延揽文士，诗酒风流，深深吸引了年轻的白居易。虽因年幼不能参与盛会，但他由此立志要成为韦、房一样的诗人郡守任职苏州或杭州。从以后白居易勤苦为学的经历看，他确实是如此努力的。少年时期江南的这段生活对其日后人生方向应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

乐天此时另一重要经历是与顾况的结识。关于二人的初次交往，流传颇广的是贞元十五年白居易在长安行卷于顾况，材料源于《唐摭言》和《幽闲鼓吹》。这则材料所记时间、地点失实，朱金城、傅璇琮二先生均已考辨二人不可能遇于长安，因贞元四年前乐天无赴长安之可能，四年后顾即永离长安^⑩。但行卷相识之事本身则是可信的，只是地点不在长安而在此时的江南。顾况贞元初年与包佶、刘太真等在长安诗文唱和，一时“举国传览，以为盛观。”^⑪贞元五年夏贬官饶州，赴任途经家乡苏州，在姑苏与韦应物等人诗文唱和颇有停留。乐天知道这样一位久负盛名的江南名士回乡，向其行卷冀其赏识推荐，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二人相识当在此时的苏州。至于有关史料记二人初识于长安，当为传播中讹误所致。我认为可能的解释是顾况用“长安居大不易”取笑乐天使然。顾况虽然此时身在江南，却拿长安开玩笑

笑，是因进士试地点一般均在长安，而科举之目的乃为仕宦。贞元年间赵修即云：“进士者，谓可进而授之爵禄也。……所谓选才授爵之高科，求士滥觞之捷径也。”^⑫而唐人仕宦重京官轻外任，那些踌躇满志的举子最大梦想不就是一登龙门仕任长安吗？天性喜谐谑的顾况自然用长安来和他们开开玩笑了。长时间后，人们就由此将二人结识地误为长安了。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诗人对白居易思想与人生态度及创作上的影响。顾况个性放诞、诙谐而旷达，据《国史补》卷中载：其“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唐才子传》卷三亦云其“性诙谐，不修检操。”又“志当疏逸，近乎方外”^⑬，对道教有着超乎常人的热忱，最后即隐居茅山以终。这种人生态度是对白居易后期快意自然达观闲适的人生态度是有潜在影响的。诗歌创作上影响更明显，张为《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以顾况为升堂，说明了二人诗歌之间的内在联系。赵昌平先生则明确指出两者在诗风上的继承关系，认为吴中诗派（指中唐前期顾况、皎然等世籍东吴，主要活动于江南的诗人群体）对元白诗派风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向俗体的学习上。都可以说明此点。而韦应物在苏州刺史任上的行为方式及其闲淡高雅诗风，都与白居易日后在苏杭的行为方式及后期诗歌中的闲适洒脱有着共通之处，也可以说一脉相承。日后在江州他对韦诗作了高度而准确的评价：“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谈，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与元九书》卷 45）在任苏州刺史时，为缅怀纪念韦应物专门将韦诗“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刻石^⑭，并为之作记。足见乐天对韦应物为人及诗风的仰慕。显然生活于江南的少年白居易正值人生观形成之时，一方面他受到江南优美山水及浓郁人文氛围的滋养熏陶，为后期适意人生态度的形成打下基础；另一方面韦应物、顾况等著名诗人的行为与创作又给其直接的启示，也对他日后的人生与文学创作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成年后白居易人生思想中适意达观的态度，流连诗酒亦官亦隐的放达生活，寻根溯源应始于这时的江南经历。

贞元十四年，二十七岁的白居易重回江南，到宣州准备应乡试。十五年秋，白居易“始举进士，与侯生俱为宣城守所贡。”（《送侯生秀才序》卷 43）年底即往长安，次年春进士及第，暮春即返江南省亲，直到十七年春回符离。^⑮这是他第二次重要的江南之行。乐天不在符离或洛阳而到遥远的江南应乡试，有家境困厄需赖亲友照顾的原因。在《与元九书》中，他称“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赋”，此为实情。白季庚贞元十年卒于襄州，居易母子生活非常窘迫。十四年春，乐天兄白幼文得任江南西道饶州浮梁县主簿。是夏，乐天将母亲安置洛阳，然后往浮梁依附兄长而“分微禄”。（《伤远行赋》，卷 38）且其叔父白季康此时亦在江南，任宣州溧水县令。^⑯这样

在宣州乡试有生活依靠,也有请托关节之便。但除此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白居易选择宣州乡试和此时任宣歙池观察使的崔衍有直接关系。唐科举在中唐后,乡贡已不限于原籍,举子可自由选择州郡荐举。举子至某地荐举一般会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乡贡名额。《唐摭言》卷一载“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①上州的名额比中、下州多,举子自然趋于上州。据《新唐书·地理志》宣州在大历后升为望州,时人称之为“通商鬻货,万货云从;阡道都会,敦儒泮宫。”

^②长庆间其“较缙之数,岁不下百万”,^③宣州为江南望州重镇,贡举名额应等同于上州无疑。二是州郡之最高长官是否为重贤爱才之人,此点是关键。这自然也与盛行的科举行卷风气相关。那么崔衍为何许人呢?据《新唐书·德宗纪》崔于贞元十二年秋为宣歙池三州观察使,直到永贞元年除任工部尚书,在宣州共十年,《旧唐书》卷一八八本传载其在州“政务简便,人颇怀之。其所择从事,多得名流。时有位者待宾僚率轻傲,衍独加礼敬,幕中之士,后多显达。”崔衍礼敬文士,幕中聚集了如崔俊、崔群、崔玄亮、钱徽、羊士谔等数十位文士,^④堪称群贤毕至。其中的崔群日后成为朝中名臣,为“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⑤崔衍的儒雅风采自然吸引渴望仕进的白居易不远千里欣然投就了。白居易进士及第后重回江南在向崔衍表达感激的诗中,说自己“身忝乡人荐,名因国士推。提携增善价,拂拭长妍姿”;称赞崔衍“行为时领袖,言作世蓍龟。盛幕招贤士,连营训锐师。”(《叙德书情四十韵上宣歙崔中丞》)题下自注“宣州荐送,及第后重投此诗”,卷13)“国士”、“领袖”这并非奉承之辞,是与崔衍当时的真实身份相当的。颇能说明问题的是,二十三年后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众多江东举子也因慕乐天之名竟纷纷奔赴杭州取解。^⑥可见,期待乐于奖掖贤才的崔衍的赏识是白居易贡举宣州的关键。其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在江南顺利中乡试为崔衍举贡,次年在长安一举及第。从此他走上仕途,开始了更加绚丽而复杂的人生。

青年江南之行实现了白居易人生极其重要的跨越。长庆二年七月,五十一岁的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直到长庆四年五月初太子左庶子返洛阳。仅11个月后,即宝历元年五月初又回江南任苏州刺史,至宝历二年十月因病罢职。这是他第三次长时间生活于江南,但也是最后一次,此后乐天再未回过江南。

白居易回到青少年时代避乱流离之地,官居显要实现了刺守一郡的夙愿,加上远离朝中逐渐兴起的朋党纷争,心情甚为轻松闲适。这时江南作为朝廷的财赋中心,经济与社会地位又有上升。乐天亦称“杭土丽且康,苏民富且庶”(《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卷22);“况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兵数不少,税额至

多。”(《苏州刺史谢上表》卷68)苏、杭繁华的街市、宜人的气候、美妙的乐舞、秀丽的自然风光等等,皆让他陶醉,让他流连忘返:

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霜轻未杀萋萋草,日暖初烘漠漠沙。(《早冬》,卷20)

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正月十五日夜月》卷20)

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补遗一)

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登阊门闲望》卷24)

当初在江州他流连风景,还多是因仕途挫折遭贬谪而采取的一种排遣寄托的方式,此时面对苏杭美景则迥然是发自内心的沉醉了。“苏杭自昔称名郡,牧守当今当好官。两地江山踢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咏怀》,卷24)在杭州他自称“诗酒主”:“杭州风光诗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元微之除浙东观察使喜得杭越邻州先赠长句》卷23)在苏州则自称“诗太守”:“何似姑苏诗太守,吟诗相继有三人。”(《送刘郎中赴任苏州》《补遗》一)正因此,与远近诗友赠答酬唱,举办诗文酒会,欣赏吴越歌舞,携妓览名胜访佛寺等等,成为他此时公务之外的重要生活内容。在杭州、苏州三年多的时间里,白居易闲适、杂律诗数量大增,诗歌创作继任职翰林之后进入又一个丰收时期。

乐天此时的诗歌将新乐府的流畅自然和《长恨歌》等长篇叙事抒情诗的绮丽优美结合起来,思想自我调适后的安闲适意、流连山水的从容自得、沉醉诗酒乐舞的雅兴逸致,在这时的诗作里得到传神的表现:

夜舞吴娘袖,春歌蛮子词。犹堪三五岁,相伴醉花时。(《对酒自勉》卷20)

谢安山下空携妓,柳恹州边只赋诗。争及湖亭今日会,嘲花咏水赠娥眉。(《候仙亭同诸客醉作》卷20)

玲珑篴簇谢好筝,陈宠箜篌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李娟张态君莫嫌,亦拟随宜且教取。(《霓裳羽衣歌》卷21)

萍醇茗溪醕,水松徐江麟。侑食乐悬动,佐欢妓席陈。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歌节点随袂,舞香遗在茵。(《郡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卷21)

不厌西丘寺,闲来即一过。……摇曳双红旆,娉婷十翠娥。(句下自注“容、满、蝉、态等十妓从游也”,《夜游西武丘寺八韵》卷24)

这些作品真实反映了乐天对江南文化传统的重雅趣、爱自然、尚逸乐精神的认同与追慕。商玲珑、谢好好、陈宠、沈平为杭州乐妓;李娟、张态乃苏州歌妓。乐天在杭州、苏州先后组织她们排练长安流行的《霓裳羽衣舞》及其他曲舞。吴二娘为长庆间江南歌女,擅作歌词,乐天极欣赏其《长相思》“暮雨潇潇郎不归”词。^⑦唐史料中对白居易这种“携觞领妓处处行”(《题灵岩寺》,卷21)的

生活记载颇多,《唐语林》卷二:“白居易长庆二年以中书舍人为杭州刺史,……时吴兴守钱徽、吴郡守李穰,皆文学士,悉生平旧友,日以诗酒寄兴。官妓商玲珑,谢好好巧于应对,善歌舞。”《旧唐书》卷166本传云其“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乐天对其诗酒乐舞的优雅闲适生活是颇为自得的,从上引《候仙亭同诸客醉作》可知,他认为自己在江南的风雅兼有东晋谢安和梁柳恽之风流,实际是说超过他们了,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即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乐天在离开江南回北方后的岁月里,为何有那么浓烈的江南情结,创作如此众多的回忆怀念江南的诗歌了。

白居易此时在江南,对江南文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和越州刺史元稹、湖州刺史崔玄亮、苏州刺史李琼等人,在江南兴起了以赠答酬唱宴咏为主要形式的群体文学创作风潮。《旧唐书》本传载其在杭与元稹“篇咏往来,不间旬浃”。《唐诗纪事》卷39记“玄亮与元微之、白居易皆贞元初同年生也。……后白刺杭州,元为浙东廉使刺越,而崔刺湖州。……三郡有唱和诗,谓之《三州唱和集》。”另据《宋史·艺文志》三人此时还有《杭越寄和诗集》一卷,陈尚君师考订三州唱和当在长庆三、四年间。惜此二集宋后俱佚。元白则将他们之间的唱和寄赠之作编为《元白唱和集》十四卷和《因继集》三卷。^②足见此时江南文坛之活跃。正因此乐在杭州时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以求乐天赏识首荐。其中的佼佼者张祜与徐凝,更是为争解元摆开了诗文擂台。最终徐凝以“今古常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③为乐天激赏而夺魁。白居易闲适、放达诗风也引起许多诗人的模仿,他在苏州称“闻道毗陵诗酒兴,近来积渐学姑苏。”(《戏和贾常州醉中二绝句》其一,卷24)毗陵指常州刺史贾餗,在常州学习模仿白居易的诗酒文会。所以,远在夔州的刘禹锡不禁感叹:“鳌惊震海风雷起,蜃斗嘘天楼阁成。莫道骚人在三楚,文星今向斗牛明。”^④因元白二人在江南的诗歌创作风起云涌冠领南北,文曲星已不在三楚而悬耀于江南上空。白居易戏称自己与元稹为文友诗敌,“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于吴越间,亦不幸也。”(《刘白唱和集解》,卷69)实际就是说他们二人独步江南。毫无疑问,白居易元稹等人所在的江南为朝野瞩目,可谓引领当时诗坛风骚。

白居易元稹在杭越还发明了一种特别的传递诗笺的方式——竹筒贮诗。乐天称“拣得琅玕截作筒,絨题章句写心胸。随风每喜飞如鸟,渡水常忧化作龙。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长篇,因以此答》卷23)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亦载“自唐白居易为杭州刺史,元微之为浙东观察,往来置邮筒,唱和始依韵,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数十言,篇章甚富。”以青青翠竹装盛诗文,确实别

出心裁雅致脱俗。白居易等把传统文士的高雅之趣和浪漫之兴完美结合起来,我们自然会想到晋王羲之等人在兰亭宴集的曲水流觞,只不过王羲之借春水佳酿写胸中之兴,元白则凭琅玕翠竹发脱俗之思。中国古代诗文追求的意境与象征之美,在元白手中将之体实化了,确实应算是王羲之之后的文人风流之最了。乐天此举可谓深得江南人文精神之精髓。

由乐天在江南的生活与创作可看到其思想与生活态度的新发展。元和二年至五年任翰林学士及左拾遗间,乐天指陈时弊刚直敢言,是他一生中最高富积极精神的时期。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乐天思想发生转向。正如傅璇琮先生所云:“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但同时又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在这之后他就逐渐疏远政治,趋向闲适。”^⑤元和六年因丁母忧辞职居下邳乡村时,他便感叹“三年作谏官,复多尸素餐。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岂无平生志,拘牵不自由。”并体会到“人生不过适,适外复何求?”(《适意二首》卷6)厌恶官场、向往自然的“适意”思想因素已经十分明显。贬谪江州是其后期适意思想迅速发展的阶段,政治上的挫折使他充满委屈与苦痛,“独善”迅速超越“兼济”成为主导思想,“适”、“适意”、“安闲”成为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他说“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草堂记》卷43)从此以后的十年中,他虽官居显要,但人生态度与行为方式与任翰林学士时已经完全两样了。

在苏杭乐天后期思想最终成熟、稳定下来。“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咏怀》卷8)吴越迷人的水乡风光及尚享乐的社会风尚,正合其“适意”情怀。在尊显雍容安闲自由的郡守生活中,其后期人生思想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优游山水、听乐观舞、诗酒唱酬成为其适意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和最佳表现方式。诗人沉浸其中,透出发自内心的愉悦,完全没有在江州时的那种无可奈何与心有所待。他这时的诗歌中也很少看到在江州创作所表现出的委屈与矛盾。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乐天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⑥其实还有“适意”。“知足”与“适意”共同构成其处世和行为的准则与依据。他晚年退居洛阳时说得更明白:“今寿过耳顺,幸无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饥寒,此一乐也。……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序洛诗》卷70)正因此我们才看到乐天此时闲适诗大增的新的创作局面。

我们还要看到乐天在江南亲近佛禅对其后期思想与人生态度的影响。乐天早在元和九年除母忧回朝廷后即开始经常性地与禅僧交往,此时在杭州、苏州更是遍游名寺广交名僧。他与灵隐寺道标、钱塘永福寺慧琳、秦望山鸟窠道林禅师等关系极为密切。^⑦“晚随酒客

花间散，夜与琴僧月下期。”（《春兴》残句，补遗一）“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留题天竺灵隐两寺》，卷23）是其亲近佛禅的真实写照。安史之乱以后，禅宗迎合中国士大夫的心理，融入中国传统知识、思想和信仰，渐渐向自然和适意的人生哲理方向转化。葛兆光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宗教退化成了生活，由信仰而来的精神超越被日常生活的平常绵延所替代，惟有一种以自然适意为最高理想生活境界的思路，渐渐在佛教信仰者，尤其是上层信仰者中弥漫开来。”^③确实自中唐开始，士大夫将禅宗倡导的“自然适意的思路”与老庄的自然思想交融，从而形成一种近乎审美的生活情趣和优雅的人生态度。白居易应是突出的代表。当然，白居易后期思想中仍然保留了儒家思想的积极成分（如在杭州苏州所作的德政），但这两种思想并没有冲突对立，而是各取所需，互为所用，乐天“个人适性与以道自任两种生活选择，就并非以对立的而是以互补的形式出现”。其实，乐天自己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醉吟先生墓志铭》，卷71）足见他刺守江南以后，其人生思想融合儒、道、佛，修身、治心、乐志并行不废，最终表现为“适意”、“知足”而成熟定型的状况。

综上所述，白居易一生与江南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江南生活在他整个人生经历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坐标，在其人生的不同阶段有着突出的位置。而江南的文化精神，如高雅趣、爱自然、尚逸乐等因素，更是直接间接地对他的人生思想、生活态度、诗歌内容、风格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江南文化与经历为我们深入理解白居易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注释：

① 唐时“江南”概念较广泛且前后有变化，初唐时一般指长江以南岭南以北的现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全境及苏南、徽南、鄂南的广袤地区，即江南道的范围；开元间分为江南东、西两道及黔中道；中唐后其指称范围缩小，多指现浙江、苏南、徽南及江西部分地区，与后来狭义之江南接近。本文所用“江南”乃近代以来通行的狭义江南。

② 本文所引白居易诗文均出自 郭明、聂世美校点本《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只随文标注篇名卷次。

③ 关于乐天此次避乱江南的具体起讫年月，因文献不足学术界仍有争议，有的定为17岁到20岁，有的定为15岁前后，本文采用通行的朱金城先生之说，定为12岁到18岁。参见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4页。

④ 穆员《工部尚书鲍防碑》，《全唐文》卷七八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0页。

⑤ 顾况《送宣歙李衡推八郎使东都序》，《全唐文》卷五

二九，第2378页。

⑥ 《唐才子传校笺》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2页。

⑦ 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牧守”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⑧ 《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附《孺复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325页。

⑨ 劳格《读书杂识》卷七《杭州刺史考》转引自《唐才子传校笺》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8页。

⑩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顾况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7—400页。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第12页。

⑪ 刘太真《顾著作宣平里赋诗序》，《全唐文》卷三九五，第1777页。

⑫ 李奕登科记序》见徐松《登科记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⑬ 《太平广记》卷二〇二引《尚书故实》，中华书局1961年新1版，第1527页。

⑭ 此联为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中诗句，《全唐诗》卷一八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01页。

⑮ 贞元17年秋乐天又曾到宣州祭悼去世的从兄，但时间甚短。

⑯ 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⑰ 《唐摭言》卷一“贡举釐革”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

⑱ 阙名《大唐宣州刺史薛公去思碑》，《全唐文》卷九九〇，第4547页。

⑲ 元稹《授卢崕监察里行宣州判官制》，《全唐文》卷六四八，第2908页。

⑳ 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433页。

㉑ 陈寅恪《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26页。

㉒ 《唐摭言》卷二“争解元”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页。

㉓ 陈尚君师《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卷28引《吟窗杂录》卷五十有关于此词之辨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80页。

㉔ 陈尚君师《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载《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210页。

㉕ 徐凝《庐山瀑布》，《全唐诗》卷四七四，第5377页。

㉖ 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诗，有柳色春藏苏小家之句，因而戏酬兼寄浙东元相公》，《刘禹锡集》卷31，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18页。

○27 傅璇琮《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㉘ 陈寅恪《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载《元白诗

②9《景德传灯录》卷四《道林禅师传》四部丛刊本。

③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卷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86页。

[参 考 文 献]

[1]丁如明,聂世美校点本.白居易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朱金城.白居易年谱[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

[5]陈尚君师.全唐诗补编[M].中华书局,1992

[6]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M].中华书局,1989

[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9]蒋寅.大历诗人研究[M].中华书局,1995

[10]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M].中华书局,1980

[11]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12]陈尚君师.唐代文学丛考[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3]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4]谢思炜.白居易的人生意识与文学实践[J].中国社会科学,1992(5).

[15]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J].中国社会科学,1984(4).

(责任编辑:徐柏青)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angnan culture and Bai- juyi's thought and works

JING Xiaodong

(Literature College,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2 China)

Abstract Baijuyi lived in jiangnan to avoid war in his Teenage time so he not only understand the life of jiangnan but also got nurtured by the culture of it. He went to take examination in Xuanzhou in his youth and passed it that was important for him to achieve a leap forward in his life. He careered mayor in Hangzhou and Suzhou in his old age. Baijuyi's quiet and happy thought and attitude of life had matured and stereotyped and his works of poetry accessed a boom period again. The period of Jiangnan riched his life. The loving of nature, attending of interest and pursuing of happiness about Jiangnan culture had influenced his thought and works deeply.

Key words: Bai- juyi; jiangnan; culture; experience; thought; works